

近代

蒙古

金海 著

历史 文化 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近代

蒙古

金海
著

历史文化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

作 者 金 海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封面设计 徐敬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呼市欣欣彩虹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17-7/Z·583

定 价 43.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金海，又名阿拉腾达来(Altandalai)，1955年11月11日出生于内蒙古乌审旗沙尔利格，蒙古族，努何腾(Nuheten)氏。1978年3月，考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81年12月毕业后，留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从事蒙古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至今。期间，1998年9月～2002年6月，在内蒙古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史学会理事。

从1982年至今，用蒙、汉、日文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先后出版《日本与内蒙古》(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两部个人专著和“内蒙古革命史”(副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蒙古族——内蒙古正蓝旗巴彦胡舒嘎查调查》(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蒙古史纲要》等12部合著以及《鄂温克族资料汇编》(主编)、《鄂温克族资料汇编》(主编，蒙古文)、《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一辑，主编，蒙译汉)等三部史料汇编。

《日本与内蒙古》一书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首届政府奖二等奖(2006年)；《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一书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一等奖(2008年)；《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论文)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青年奖(1996年)；《内蒙古革命史》(合著，副主编)一书曾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内蒙古哲学社科规划项目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1999年)、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1998)、首届内蒙古图书奖(1999年)；《蒙古民族通史》(合著)一书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中国图书奖(2004年)；《内蒙古历史地理》(合著)一书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首届内蒙古图书奖(1999年)；《百年风云内蒙古》(合著)一书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内蒙古通史纲要》(合著)一书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2008年)。

目 录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1)
蒙古青年革命党及其主要活动	(24)
《民族词典》内蒙古部分正误琐记	(38)
《乌兰夫年谱》史料订正札记	(50)
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	(65)
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行政建制沿革研究	(81)
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实质	(133)
日本时期的内蒙古盟旗制度	(148)
1931~1945 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	(170)
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	(183)
日本在内蒙古确立殖民统治及其对蒙古民族运动的政策	
近代喇嘛教与蒙古地区政治	(201)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体系	(285)
关于“蒙疆政权”教育方针及政策	(295)
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述略	(307)
民国时期蒙古族历史与文化概要	(320)
关于伪满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教育体制	(344)
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述略	(414)
附录:金海论著目录	(427)
后记	(450)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 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为了同化和消灭蒙古民族，在伊克昭盟地区推行了一条“反共灭蒙”的反动政策，从而酿成了震动全国的“伊盟事变”。这次“事变”不仅在蒙古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①然而，史学界对于“伊盟事变”的起因、经过及意义的论述却不多见。笔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及当事人回忆资料，着重对“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对这次“事变”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

1943年3月26日，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500多人和该旗人民群众一起，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盟政府所在地——新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4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镇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消灭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僚和特务；接着，在4月15日，伊盟乌审旗保安队和人民群众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袭击了驻扎在该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一时各蒙旗保安团纷纷集中”，^①准备响应这次起义，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伊盟事变”。这次起义的发生是当时伊盟蒙古族人民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集中反映，也是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直接领导下日益觉醒的重要标志。我们探讨这次“事变”的起因，就必须从伊盟地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答案。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找出其内因、外因中的本质性原因。为此，首先必须弄清伊盟地区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特点。

伊克昭盟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为邻，是阻止日军西进南下的前沿阵地，也是从陕甘宁边区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际交通要道之一，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正因如此，国民党为了缩小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圈，于1941年冬季成立了“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派大批正规部队进驻伊盟，挤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把伊盟变成了它进攻陕甘宁边区，夹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地之一，这是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

国民党为了巩固它在伊盟的统治，对蒙古族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妄图同化和消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益觉醒的蒙古民族。国民党伊盟守备军司令陈长捷到伊盟以后，就曾公开说过：“余与别人不同，是（蒋）委座派来镇压你们蒙古的”。^②

^① 《骑七师政治部主任吕纪华呈送关于伊盟事变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8。

^② 沙克都尔札布《札旗事变之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分析伊盟形势时就曾明确指出：在伊盟威胁蒙古族人民生存的不是日伪，而是以陈长捷、何文鼎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蒙古族人民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出路的。这就说明，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进驻伊盟，这个地区的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说，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各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占着主导地位，但是作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伊盟地区，伊盟人民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却成了主要矛盾。这就是当时伊盟地区社会矛盾的新特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对国民党在伊盟推行的一系列同化和消灭蒙古民族的反动政策和措施，需要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国民党为了严密控制伊盟的政治、军事，首先在各部门实行了特务统治。在当时的“绥境蒙政会”、“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以及“察绥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蒙旗三民主义青年团特派员办事处”等机构中布满了国民党中央统、军统特务，并且在各旗王府架设电台，派去“协赞专员”、“政治指导员”、“调查员”等特工人员，使特务势力渗透到全盟各旗的政府和保安队里。这些大小特务时刻监视着各旗王公、仕官和保安队官兵的一言一行，每天向东胜、榆林和重庆报告各旗王公和保安队的情况。从旗札萨克到一般牧民，从保安队司令到普通士兵，从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到每个重要人物的思想状况以及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私生活等无不在他们的刺探告密之列。这些特务横行无忌，干涉盟旗事务，强迫王公和保安队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就连伊盟盟长、保安总司令沙克都尔札布也被控制在他们手中，使其没有一点实权。他们对于那些倾向于进步，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表示不满，稍有一点民主思想的人，则加上种种罪名，进行迫害。如在1942年11月，他们以“通共”之罪杀害了要求抗日、倾向于缉捕的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他们认为“乌（盟）、伊（盟）各王公及重要仕官最好留在中央，导以高

官厚禄，勿令常川驻在本旗。”^①所以对有些个别王公和实权人士，假“调训”或以“学习”、“参观”之名，调离本旗，剥夺他们的实权，甚至加以迫害。曾对国民党表示过不满的达拉特旗保安队司令马子禧在重庆被害就是一例；又如伊南游击司令部司令章文轩也被他们认为是“思想转移”，准备要调往重庆受训。正因如此，“伊盟事变”结束后，傅作义就建议将沙克都尔札布“调至陕坝或榆林”，“最好使其赴榆”，^②并把沙王的长子鄂其尔胡雅克图也调到重庆“学习”，让他的不满十岁的小孩来执掌伊盟军政大权。

国民党又在农村牧区推行保甲制度，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统治，从1942年起，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以“抗日防奸”为名，在伊盟推行保甲制度，向各旗派去“协赞专员”，在蒙民、喇嘛中强行编组保甲。保甲作为农村牧区基层政权组织，与旗和苏木并存，广大牧民除了负担旗和苏木的徭役、捐税以外，还要担负保甲的各种摊派、劳役。这样一来，不仅使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王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蒙古族人民身上又加了一层剥削和压迫。因此，1942年8月至12月，在伊盟达拉特旗连续爆发了四次反对保甲制度的“独贵龙”运动。达拉特旗农牧民“集众开会反对（绥远）省府编组保甲、征购公粮、征购皮毛”，^③各旗王公札萨克也纷纷“联合呈请绥远省政府停止编组保甲”。^④这就说明了国民党的这一政策，在伊盟各旗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对。达拉特旗的这次“独贵龙”风潮，预示着

^① 《绥远省党部指导专员牛进禄对于改进蒙旗问题之建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317。

^② 《傅作义致军政部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9。

^③ 《周文蔚为达旗等不设保甲给蒙藏委员会的快邮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439。

^④ 《周文蔚为达旗等不甘设保甲给蒙藏委员会的快邮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439。

更大的反抗风暴即将到来。

国民党除了实行特务统治和推行保甲制度以外，在军事上对蒙旗仅有的一点武装力量——保安队则采取了重兵震慑、派人直接控制的措施。当时伊盟地区的军事形势是西有马鸿逵部，东有马占山部，南有邓宝珊、高双成部，北有傅作义部。伊盟守备军3万多人，^①驻扎在伊盟各军事要地，严密监视着各旗保安队的动向。整个伊盟地区处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直接制控和重重包围之中。国民党对各旗的保安队“严定军额”，^②不许“随便扩充”。^③他们为了分化蒙旗武装力量，每个旗委任了一个保安司令，使全盟军事力量不能统一。又为了便于统一掌握和控制，在各旗保安队之上设立了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名义上以沙克都尔札布为总司令，但实权都被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兼任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司令）和安插在保安长官公署里的大小特务所把持，沙克都尔札布成了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司令。每个旗的保安团里设立“团政治指导员室”，派去“团政治指导员”、“军事指导员”等特务人员，借集中“训练”之名，向保安队士兵灌输反动思想，进行直接监督和控制，以便利用保安队士兵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驱使他们同八路军作战。国民党以“统筹给养”为名，禁止保安队从地方征集粮饷，而“统筹”的给养保安队根本得不到。所以各旗保安队士兵对国民党的这种铁血统治早已积下了满腔的仇恨。

国民党残酷的经济掠夺更使伊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20世纪初，清政府以“移民实边”为名，大量放垦蒙旗牧场，结果使伊

① 《王志斌建议整理伊克昭盟意见书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75。

② 《绥远省党部指导专员牛进禄对于改进蒙旗问题之建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317。

③ 《绥远省党部指导专员牛进禄对于改进蒙旗问题之建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317。

盟的大片牧场变成了贫瘠荒凉的沙漠。当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为日寇殖民地以后，在幸存的伊盟这块地方，国民党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开垦牧场、掠夺土地的反动政策。国民党不顾伊盟人民的反对，从山西、陕西等地招来大批农民到伊盟开垦牧场。1942年，蒋介石在天水召开军事会议时，陈长捷就“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建议在伊盟开垦五万顷”，“蒋当即指示陈长捷试垦五千顷以后继续开垦”。^①陈长捷得到蒋介石的许可后，于同年9月到札萨克旗王府，同沙盟长会晤，强迫他答应从“各旗要五千顷”^②的牧场进行开垦。当时遭到了沙王理所当然的拒绝。陈长捷视蒙古人民软弱可欺，在没有取得蒙旗同意的情况下，下令开垦“一万顷”。^③沙克都尔札布几次派人前往东胜同陈长捷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开垦。陈长捷反而以蒋介石的命令相威胁。当开垦的消息传出后，全盟蒙古族人民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于是沙王在1942年10月初三（阴历）借祭祀成吉思汗陵寝之际，召集全盟七旗官员，讨论反对开垦问题。会上“七旗坚决反对开垦，主张继续和陈长捷商谈，并决定翌年3月26日在东胜开会，向陈长捷一致要求，停止开垦。如果对方坚决不接受，再另行研究决定。”^④陈长捷得知全盟上下一致反对开垦的消息后，命令继续开垦，并用引诱拉拢的手段在蒙旗内部寻找其代理人。

^① 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沙克都尔札布《札旗事变之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③ 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5页。

^④ 鄂其尔胡雅克图《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第3页。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1942年12月间，沙王派白音仓^①前往东胜谈开垦问题，答应可以开垦少量荒地，想以此来得到陈长捷的让步。可是白音仓早被陈长捷所收买，所以他擅自代表伊盟七旗，答应了陈长捷的大面积开垦的无理要求。返回札萨克旗以后，又没有向沙王如实汇报。到了1943年2月，国民党中央拨给陈长捷100万元“军垦费”，他立即在东胜设立了“屯垦督办公署”。他以为有国民党中央支持，并且蒙旗方面已经有人允许大面积开垦，所以再次扩大开垦数量，“增至两万顷”。^②实际上“武装员兵四出，见地即占，等于无限制之开垦”，^③并“将大小伊金霍洛陵地、庙宇、鄂博等神灵禁地，分别威胁当地官员签名盖印，即时占取”，^④“蒙人有坐哭其地要求先死者置之不顾”。^⑤这就不但直接侵犯了蒙古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和生存条件，而且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自尊心。

国民党不但大量移民开垦，掠夺牧场，而且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无休止的征粮征畜、拉夫派款等手段勒索伊盟人民。伊盟地区自从1941年以来，连续干旱成灾，农业区“粮食连年歉收”，^⑥牧区牲畜大批死亡，人民生活处在极端贫困的地步。当时国民党的些报告中曾写到：“札旗南部三里界一里半等地，野菜殆尽，饥

① 白音仓，北京雍和宫白大喇嘛私生子。经白大喇嘛介绍担任沙王随从，并在绥境蒙政会任职。由于他擅自代表伊盟七旗答应了陈长捷的无理要求，引起札萨克旗军民的切齿痛恨。1943年旧历正月十七日，他从榆林返回札旗途中被札旗保安队士兵刺杀。这件事便成为爆发“伊盟事变”的导火线。

② 沙克都尔札布《札旗事变之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③ 沙克都尔札布《札旗事变之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④ 沙克都尔札布《关于伊盟事变的通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⑤ 《骑七师政治部主任吕纪华呈送关于伊盟事变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8。

⑥ 《绥蒙时事旬报》第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864。

民迫不得已，到处素食”，“无法继食之家，逃荒他处。”^①此外，大批国民党军队驻扎在伊盟各旗，“军粮无着”，^②士兵四出抢掠、骚扰，更使人民的生活濒于绝境。国民党当局不管人民的死活，强迫向各旗大量征粮、征畜。1942年绥远省政府已经从伊盟征粮2万石，同年12月，陈长捷又命令从鄂托克、乌审、札萨克、杭锦、郡王、准格尔等六旗征粮8万石。并且“征粮一斗，须加缴2升，并附草十斤”；又从“鄂托克旗强征驼五百，札萨克旗车二百，乌审旗马三百。”^③牧区本来不产粮，国民党却加以蒙古族牧民“应该有军粮的负担”，“本能上有这种义务”^④的荒谬理由，强迫向牧民征粮。牧民无粮可交，只好到几百里以外的农区用牲畜换回粮食再去缴纳。用牲畜换粮，也是国民党所不允许的。因为他们不但征去十分之三的牲畜，而且将剩余的部分也以“统购统销”的名义，“禁止宰杀或出售”，甚至“牲畜有倒毙时，规定按登记数目赔偿。”^⑤对于那些无粮无畜可交和请求减轻数量者，“则诬以汉奸论罪”，^⑥轻则毒刑拷打，重则处死。当时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份报告中就曾写道：“因无粮可交而被拘押者日必数报。”^⑦仅1942年一年之内，伊盟守备军司令部就以各种借口枪杀了“一百余人之多”。^⑧

① 《绥蒙时事旬报》第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864。

② 《绥蒙时事旬报》第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864。

③ 《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④ 黎圣伦《论伊盟事件》，载1943年5月10日《陕北日报》。

⑤ 《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⑥ 《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82。

⑦ 《骑七师政治部主任吕纪华呈送关于伊盟事变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8。

⑧ 《骑七师政治部主任吕纪华呈送关于伊盟事变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8。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在这本书中否定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存在，提出了中国各民族是和汉族“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的反动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企图给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找一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同化和消灭少数民族的反动政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一切充分说明，由于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使伊盟人民同国民党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了这一地区主要矛盾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盟的蒙古族人民就面临着两种前途：一个是在这种压迫之下，无声无息地灭亡；一个是为了争取生存和解放，奋起反抗。

蒙古族人民，尤其是伊盟的蒙古族人民，具有敢于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传统。近代以来，伊盟蒙古族人民以独特的“独贵龙”运动形式，同反动统治阶级和军阀进行过多次的生死搏斗。自从1858年卓勒吉尔嘎勒、丕力杰等牧民为首第一次在乌审旗举起“独贵龙”运动的大旗以来，伊盟各旗的“独贵龙”运动持续不断，其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其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锡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这次运动后来由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有了争取的方向，曾一度在乌审旗推翻了封建王公的统治，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这在内蒙古革命，以及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次“独贵龙”运动虽然在全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式下失败了，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乌审旗和札萨克旗保安队里，就有很多锡尼喇嘛领导的革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骨干分子。“伊盟事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老瑞，就曾参加过锡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在他周围有20多名“独贵龙”活动时代的战友。这些人在这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伊盟事变”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就说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伊盟的蒙古族人民也开始觉醒了。他们为争取民

族解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伊盟地区的革命斗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就走上了正确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支持和帮助蒙古民族解放事业,承认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和民族自决自治权的主张;号召蒙古民族不分平民王公,组织起来,发扬蒙古民族的光荣传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实现蒙古民族的解放。不久,派田万生、曹动之等人带着蒙汉两种文本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分别到乌审旗、杭锦旗一带开展工作,积极向蒙古族各阶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使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蒙古族人民再次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因此有不少蒙古族牧民和保安队士兵自动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投奔到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1月,在延安学习的伊盟蒙古族牧民就有50多名。

1936年夏,中共三边特委成立,下设蒙古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伊盟地区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向伊盟各旗派去工作人员,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员,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正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中共神(木)府(谷)地委派李登瀛、杨建林、鲁富业、王璞等人到札萨克旗做上层工作,会晤了伊盟孟长沙克都尔扎布,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团结国内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张。自从1937年10月,归绥、包头相继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以后,伊盟地区的形势非常紧张,随时有沦陷的危险。就在这个时期中共三边特委再次成立,直接领导伊盟地区的工作,并派工作组深入札萨克、杭锦、郡王、达拉特旗开展工作。1938年1月,三边特委召开会议,分析“七七事变”后的内蒙古地区形势,确定了党对内蒙古工作的方针和具体策略,指出承认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蒙古民族自决自治的同时还要强调“蒙汉联合抗日”，“蒙古平民与王公一致团结抗日”。为了有效发动群众，确定了对蒙古族采取联络上层，通过上层发动下层的工作方针。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①和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从三边进入伊盟桃力民地区，以桃力民为中心向乌审、鄂托克、郡王、杭锦、达拉特、札萨克旗及东胜开展“抗日救蒙”工作。同年秋季，当沙王赴重庆途径延安时，曾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这使沙王等伊盟蒙古族上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伊盟人民建立起了抗敌后援会、战地动员委员会、蒙汉游击队等抗日组织。这就不仅保卫了伊盟，使伊盟的混乱局面趋于稳定，而且更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伊盟各阶层人民中的政治影响。1938年11月，中共伊盟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全面领导伊盟地区的工作。1940年，中国共产党拟订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蒙古族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1941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进伊盟以后，不仅把共产党污蔑为“破坏抗战”、“奸党”，而且从伊盟地区挤走了积极抗日的八路军骑兵第3营^②和中共伊盟工委，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使党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伊盟地区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乌审旗工委和鄂托克工委继续领导这两个旗的工作。党的许多工作人员继续在伊盟各旗人民群众中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直接领导，使蒙古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帮助蒙古民族争取民族解放，而国民党是要同化和消灭蒙古民

① 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4月，白如冰任书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绥蒙工作委员会之名称随之取消。

② 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于1938年冬撤回陕甘宁边区时在伊盟地区留下一个排。中共伊盟工委在这个排的基础上组建了骑兵第3营。

族的。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是导致“伊盟事变”的外因的话,那么,伊盟地区的蒙古族人民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及直接领导下日益觉醒的伟大力量就是“伊盟事变”的内因。在内因、外因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伊盟事变”的爆发是势所必然的了。

二

国共两党对“伊盟事变”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国民党采取的是军事上镇压、政治上欺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这次起义则采取了军事上帮助、政治上支持,帮助蒙古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政策。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策及各种措施分别加以分析。

国民党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3月26日到6月初为止。这一阶段中,国民党采取的是以军事镇压为主、政治欺骗为辅的策略。札萨克旗军民举行起义以后,向国民党政府及傅作义、陈长捷电告起义原因,并提出要求,又向各方面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可是蒋介石电令傅作义、陈长捷等“对札旗叛徒应用武力彻底解决,不必多顾虑”。^①于是国民党对起义者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悍然出动大批武装部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这一阶段中,国民党为了迅速镇压起义,采取了下列具体措施。

1. 以平息“事变”为名,大肆烧杀抢掠。镇压札萨克旗起义的国民党军队,自从4月1日占领新街镇和沙王府以后,不仅把沙王

^① 《傅作义请拨巨款安慰伊盟事变脱难人员并惩办札变祸首文件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469。